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构建完善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郑福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对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作出重大战略部署,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决定》从四个方面,即: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了32条含金量很高的改革政策。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我国在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包括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服务逐渐向农村地区延伸,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基础薄弱,历史欠账太多,我国仍然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窗口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之路,需要改革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从制度上真正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最终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破解城乡二元差距,实现城乡融合,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包括“人”“地”“钱”“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等四个问题,要深入改革、全面发力。

建立健全城乡之间“人”的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

在现有的户籍制度下,许多常住人口享受不到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待遇,社会保障覆盖面过窄。农民工中有许多都是携家带口进城务工,但他们进城后没有正式身份,在婚嫁、幼托、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着一系列困难,而办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都要有本地户口。例如在教育方面,因为住房和户籍问题,农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相当突出,我国教育体制是“分级办学,属地管理”,这使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子女难以享受和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条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这种改革对消除我国目前由于户籍带来的资源失衡意义重大。要优先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公共卫生、住房保障等

基本民生问题,使他们在流入地居住期间享受与户籍居民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并随着社会贡献的增加享受到更多的市民权利,打破户籍壁垒,实现“同城同待遇”。改革应推动非户籍常住人口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把农民工纳入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范围。各地要有步骤地放宽公租房申请条件,切实将农民工家庭纳入保障范围,逐步实现公共租赁住房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广覆盖,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经济、安心的住所,使之安居乐业,提高城镇化质量。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国家应从合理选址、制定适宜租金标准,简化申请流程、房源信息化管理等方面发力,提供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有效租赁住房供给,精准施策,防止“一刀切”,提高公共租赁住房供需匹配度。

建立健全城乡之间“地”的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

土地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表现为土地作为要素从农村大规模流向城市。《决定》提出要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国家层面应尽快制定统筹“三权”相关制度设计,及早出台“统筹农民‘三权’转让”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统筹“三权”转让的主体、客体和双方权利义务,明确转让条件、转让流程、转让价格标准、转让补偿资金来源、“三权”转让后利用、转让“三权”农民保障、违约责任,明确转让农户新增成员权利等问题,以便改革试点有法可依、有法可循。此外,对先行试点地区,法律应充分授权,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应建立与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民自愿有偿转让补偿制度,探索多层次多元化的转让补偿机制。要建立激励与约束双向机制。一方面,通过经济补偿、社会保障、政策补贴等有针对性的具体政策,强化利益激励,引导和鼓励农民自主选择转让“三权”。另一方面,采取设置转让条件、限制用途、禁止耕地与宅基地抛荒闲置等方式对转让行为进行有效约束,防止转让农户发生生存风险,杜绝转让后的承包地非农化与抛荒,禁止宅基地闲置与非法使用。

《决定》提出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要建立入市配套支持体系。集体建设用地价格发现依赖于集体建设用

地市场的形成。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交易平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纳入现行土地市场交易平台公开交易。探索入市计划指标管理,建立城乡建设用地供应管理联动机制,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年度入市计划与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土地收储计划、低效用地再开发实施计划同步制定、充分衔接,确保土地市场平稳有序。允许土地储备机构接受集体经济组织委托,开展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储备和前期开发工作。要建立入市土地的价值保障机制。参考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土地使用成本、同类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价格、产业政策等因素,确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底价,底价不得低于土地取得的各项客观成本费用之和。结合地方实际建立土地入市收益分配机制,合理确定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征收比例,规范调节金使用管理,完善农民集体所得入市收益内部分配机制,依法保障农民集体享有的土地财产性收益。

建立健全城乡之间“钱”的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

乡村振兴是一个大战略,必须有真金白银的硬投入,要健全投入保障制度,创新投融资机制,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投入力度不断增强、总量持续增加。促进“钱”在城乡之间流动,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健全农业农村投入保障机制,必须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形成由财政、金融、社会资本“三驾马车”拉动的多元投入格局。

在财政收支形势趋紧的背景下,国家仍坚持把“三农”作为公共财政的支出重点,优先保障“三农”投入稳定增长。要将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制定落实提高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业农村比例考核办法。要进一步完善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支持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用于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和乡村建设行动。

健全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要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银行等涉农金融机构拓展涉农业务范围,加大支农金融服务创新;拓展农村金融服务网络,鼓励银行机构在县域和网点空白的乡镇设立分支机构,

通过POS机、ATM、微信支付、惠农金融服务点等多种形式延伸服务设施和服务能力。要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支持力度,保持涉农信贷投入持续增长。丰富农村信贷产品体系,探索扩大以果品、涉农仓单、大型农机具等涉农物权为抵押的金融支农信贷产品,探索发展“公司+农户”“公司+中介组织+农户”等新型信贷模式。要提升“三农”保险保障能力,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品种和覆盖,积极推进特色优势农产品保险试点,全面提升农业保险保障服务能力。

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乡村振兴。要打破社会资本下乡的障碍,吸引外部资本的投入,因地制宜创新投融资模式,通过独资、合资、合作、联营、租赁等途径,采取特许经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健全联农带农有效激励机制,稳妥有序投入乡村振兴。

建立健全公共资源向农业农村优先配置的体制机制

推动公共资源向农业农村优先配置,是消除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存量差距的迫切需要,也是防止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出现增量差距的必然要求。经过多年努力,农村公共资源供给体系的“四梁八柱”已经搭建起来,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变革。目前主要问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城乡差距仍然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太低。

加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应该按照城乡融合发展和城乡“不同类但等值”的原则,充分依托县域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以县城这一范围作为整体,统筹规划城乡的道路、供水、供电、信息基础设施、垃圾污水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分层分类确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序。坚持城乡协同建设,推动县城部分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

继续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以“有”到“好”作为主攻方向,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加快农村道路、生活垃圾、污水处理能力建设。

如果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体制壁垒得到有效破除,促进更多人、地、钱等要素服务下乡,就能不断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差距,全面提升乡村全面振兴,从而早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来源:河南日报

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

郝栋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关系,是坚持系统观念的内在要求,是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国家安全这个头等大事,强调“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更加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安全,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通过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才能更好保障自身安全。曾几何时,我国汽车产业受制于国外技术壁垒,大而不强,产业链供应链命脉掌握在别人手里。通过政策扶持、技术创新、品牌建设等,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换道超车”,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显著提升,产业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力说明,发展得越好就越安全。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要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就要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不断增强我们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能力,始终把我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发展质量越高,对安全的需求也会更加多样化、多层次,国家安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我国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安全保障。针对粮食安全,我们着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平时产得出、供得足,极端情况下顶得上、靠得住;针对能源安全,我们把解决油气核心需求作为重要任务,加大勘探开发力度,夯实国内产量基础,提高自我保障能力;针对生态安全,我们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着重从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等方面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有力支撑高质量发展。

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不能简单对立、厚此薄彼、顾此失彼。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科学把握两者关系,防止“两张皮”,避免“貌合神离”,让发展和安全互促共进。既要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要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更加注重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发展动力、提供坚强安全保障。来源:人民日报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395.72万亿元——金融持续发力服务实体经济

马春阳

中国人民银行8月13日发布金融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M₂)余额303.31万亿元,同比增长6.3%,比上月末高0.1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395.72万亿元,同比增长8.2%,增速比上月高0.1个百分点。

7月金融总量增长基本稳定,月末增速与上月基本相当,社会融资规模增速高于上半年名义GDP增速,保持合理增长,反映金融持续发力支持实体经济。

对于今年以来M₂增速放缓,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庞溟表示,一方面因为去年是疫情平稳转段的第一年,M₂增速明显回升,导致基数较高。从剔除基数影响的两年平均增速看,去年和今年7月末M₂平均增长8.5%,保持了流动性合理充裕。

“另一方面,金融数据‘挤水分’对总量指标也会产生影响。”庞溟说,部分虚增的存贷款挤掉后,金融数据会出现一定回落。尤其是考虑到前期企业活期存款中,有一部分通过手工补息获取了相对高的收益,这些行为规范后,企业活期存款出现下降,有些还在逐步向理财转化,这方面的影响会持续显现。

在贷款方面,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51.11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单从7月份来看,新增贷款中票据增长较多。对此,有专家表示,表内票据是贷款的组成部分,是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在满足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要求下,票据期限短、便利性强、流动性好,中小企业利用票据从银行进行贴现,与从银行贷款获得资金是一样的。

今年以来,央行持续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围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发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力度保持稳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结构进一步优化。7月末,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3.63万亿元,同比增长16.9%;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为4.17万亿元,同比增长15%;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2.1万亿元,同比增长17%,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

与此同时,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记者从央行了解到,7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65%,与上月持平,比上年同期低22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3.4%,比上月低9个基点,比上年同期低68个基点,均处于历史低位。

7月25日,主要商业银行再次下调存款利率,自2022年9月以来已累计下调5次。有业内人士反映,调整后活期存款利率将下降约0.05个百分点,各期限定期存款利率将下降0.1个至0.2个百分点,前几次下调都是大行领头小行跟进,预计这次也不例外。

招联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近期央行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利于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未来,随着利率由短及长的传导更加顺畅,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报价质量不断提高,利率政策支持实体经济质效也将进一步提升。

近年来,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快速发展,企业债券融资渠道更为通畅。7月我国政府债券净融资约7000亿元,同比多约2900亿元。近期专项债加快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和使用也在加速落地。

数据显示,7月企业债券净融资约1600亿元,同比多约310亿元,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在防范化解地方债务、城投债务融资规模整体收缩的背景下,这个结果其实是很不容易的,说明一些企业通过发债替代了贷款。

中国经济光明论

来源:经济日报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方福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其中,“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是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和政府关系提出的要求。

何谓“放得活”“管得住”

“放得活”,是指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充分释放市场的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市场化改革的路上,还需要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市场作用的空间和潜力,通过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性来激发市场活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管得住”,是指政府运用治理和管理手段,有效防控市场无序行为,维护公平竞争,有效化解市场失灵,较好地应对外部冲击和克服重大的经济波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强调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长处,以“一只手”之长克服“另一只手”之短,“两只手”协调好、配合好,真正实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只有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才能保证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市场机制是一种自动自发机制,如果只“放”不“管”,完全自由放任,会出

现市场失灵,经济在过冷过热中剧烈波动,导致出现大衰退、大萧条或超级通货膨胀,出现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史上有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一观点。如果只“管”不“放”,那就是计划经济。如果“管”得过度,“管”得不当,就会损害市场机制的活力和有效性,无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就谈不上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必须辩证看待“放得活”“管得住”,科学处理好“放”和“管”的关系,“放”“管”都要到位。

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是基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理念,用辩证的思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和政府关系提出的高水平要求,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必须相互协调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和政府“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如何实现“放得活”“管得住”

要实现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完善市场体系 and 市场机制,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供基础性的体制机制;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空间,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并实现相互促进,为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更大市场空间。另一方面,科学定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动态协调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不断提高政府“管”市场(机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要做到“放得活”,就需要构建一个能够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和创新性的经济体制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包括:

明晰产权、尊重产权和保护产权,市场主体依法行动和政府依法管理,执法司法公正公平,完善市场体系、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尊重个人利益和维护市场主体自由选择,不同所有制企业依法平等竞争,企业生产和要素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经济信息真实、公开、完全,等等。关于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决定》提出“完善产权制度”“完善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构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完善企业退出制度”“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决定》提出“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决定》强调“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些都是“放”的内容。这些内容落地生根了,市场主体就会安心、舒心,就会看好未来,有乐观预期,就有积极性去投资、创业和创新,市场就有了活力和竞争力,经济发展就有了稳定的内在动力。

如何才能“管得住”?首先,政府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政府行动纳入法制框架,遵循制度规则。其次,政府不断提高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减少和优化行政审批,对市场和经济运行实施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为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再次,严惩市场不行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有效管理公共物品和公共资源,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合理。最后,在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依靠高水平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宏观调控体系,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

学技术手段,加强对市场的动态监测和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和预测风险,有效化解市场失灵,前瞻性地逆周期调节,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和经济结构失衡,熨平经济波动,保证充分就业、经济平稳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不可能离开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也绝非西方经济理论中所说的“小政府”,因为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国有企业是重要的微观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其作用边界是无形的,分不清楚的,因此,市场和政府的作用范围和力度是动态调整变化的,不可能一成不变。解决好市场和政府关系这一世界性难题,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市场能做的放归市场;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要作用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保驾护航,同时更好发挥政府在经济中的应有作用,不仅仅是矫正市场失灵。政府的这些作用可以概括为“维护”“拾遗”“补缺”和“防控”。“维护”是指政府通过体制机制建设维护好市场秩序,包括维护市场主体权益,实施有效监管,确保市场运行顺畅和公平竞争。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有其作用不到位和其作用覆盖不了的地方,例如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完全会导致市场机制失去弹性,市场自发调节无法解决好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和公平公正分配等问题,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政府“拾遗”“补缺”就是强调解决好这些方面的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维护公平竞争。“防控”,是面对经济结构改变或受到外部冲击时,需要政府深刻认识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科学预测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的方向、供求结构的变化,以及外部冲击可能带来的经济波动风险,前瞻性地采取防控措施,有效进行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确保经济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来源:光明日报